专家视点

“四个全面”与治国理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在这一战略布局下，完成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使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 李君如

一个新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形成。在这一战略布局下，完成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使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为此，就要深化对这一战略布局的认识，把握这一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

因应时代使命的战略布局

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中央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之所以说这是时代课题或时代使命，是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之所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发展市场体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从执政党建设着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如果说这种逻辑的复原，还比较抽象，那么考察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及其提出的课题，就十分现实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溯源这些变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复杂，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时代提出的难题。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不仅如此，我们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激发活力，要靠改革；治乱，要靠法治，还要靠治党。不论搞活，还是治乱，都必须有利于并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是统一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继而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因此，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地位和意义，必须把它放到今天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使命下去认识，放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局中去认识。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因应治国理政时代使命的战略布局，是破解治国理政时代难题的战略布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大考验

从治国理政面临的时代课题及其难点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更可以体会到，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布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有一种说法，叫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果把这一说法理解为“协调推进”的是“战略布局”，让人费解。如果把这一说法解释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那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没有四个战略布局，只有一个战略布局，但是这个战略布局是由“四个全面”构成的，因此要“协调推进”。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不仅是一篇充满辩证法的大文章，而且是一场对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大考验。

考验之一，是如何使“1+3”成为一个宏大而又完美的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也就是说，尽管“四个全面”每一个“全面”都有重要意义，但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之别，不能等量齐观。“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3个全面”。只有让“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成为一个战略布局。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决不能再出现过去一些人要么不改革、不思进取，要么以改革发展为名胡作非为，甚至贪赃枉法等祸害党和国家的做法；同样的道理，无论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要始终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而不能偏离甚至冲击这一战略目标，这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局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大考验。

考验之二，是如何使“2+2”或“1+1+2”成为一个宏大而又完美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中，包含了激活、治乱两个方面的要求。前两个“全面”，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后两个“全面”，要求我们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预防、避免和克服“活”中出“乱”，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在健康的轨道上实现。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的领导方法，运用娴熟的领导艺术，才能使之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相互抵消，成为一个完美而有效的战略布局。

考验之三，是如何使“3+1”或“1+2+1”成为一个宏大而又完美的战略布局。实践告诉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党；全面依法治国，关键也在党。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但是，事实上，问题并没有像我们这里说的这么简单，在全面从严治党包括雷厉风行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如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一篇非常复杂的文章。只有在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从严治党过程中，把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激发发展、改革、法治的活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正能量，才能使“四个全面”成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讨论这些问题，讲这些大考验，就是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其内在的辩证关系，使之发挥好战略布局的作用。因此，学习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能只是把它写在讲话和文件中而不领会其深刻的内涵，不能浅表层地领会其字句而不把握其内在的辩证关系，也不能只是一般地讲道理而不用心思下功夫去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协调推进”上做出一篇好文章，实现我们的战略布局。

讨论这些问题，讲这些大考验，就是要形成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良政”，学会按规矩办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好，全面深化改革也好，都要有规矩，既不能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也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更不能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学习怎么样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形成和完善利国利民的“良政”，大家都能够依法依章改革发展。

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我们肩膀上承担的治国理政这一时代使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新常态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破解“乱作为”和“不作为”

学习和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干部，特别要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对干部队伍的这一判断，我们决不能动摇。同时，也必须看到有的干部过去思想不纯、作风不正，乱作为，现在又走向反面，明哲保身，不作为。这两种情况，都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障碍。今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这不仅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重要部署，也是落实整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部署，是解决“乱作为”和“不作为”两方面问题的重要举措。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针对的就是“乱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不良官风。多年来，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以改革为名乱作为，甚至违法乱纪。十八大以来，又出现了干部不作为的新情况。针对这两种情况，2014年3月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过程中，就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在同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再次指出：“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因此，“三严三实”是在“严”与“实”的统一中，解决我们队伍中“乱作为”和“不作为”问题的治党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严三实”，具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他说过：（1）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2）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3）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4）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5）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6）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显然，“三严三实”就是要求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既不能“乱作为”，又不能“不作为”，而是要在严守党纪国法下有大作为。

总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治国理政任重道远，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锲而不舍地向前推进，还要打好今天的每一仗，一丝不苟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在今天，我们只有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照“三严三实”要求，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才能使我们的各级干部既严格依章依法办事，又勇于开拓创新地为民执政、为民办事，才能真正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党内互称同志是党的优良传统

党内互称同志，是中央对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规矩。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积极主动在党内活动中互称同志，使党内互称同志蔚然成风。

□ 陈 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其后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员之间不分职务高低一直以“同志”互称，通过翻阅当时的党内文件、信件以及观看反映当时党内生活影视作品，我们还能感受到当时党内互称“同志”已成气候并形成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尊敬，在党内的文件中出现了称呼职务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1959年8月3日，毛泽东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中央领导，认为“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1965年中央还专门就党内称呼问题发出《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

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在党内所有党员尽管工作分工有所不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中共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也将党的领导人称为同志。十八大后中央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对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后，160件被废止，231件宣布失效，20件继续有效。其中，就包括1965年《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可见党内互称同志依然有效，仍是中央对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规矩。

众所周知，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党内活动中很难听到互称同志的声音。即使是在党委会上，甚至在党小组会上，党员之间也都互称官衔，不称同志。党内称呼出现了不太好的四种倾向。一是党内称呼官职化。在党内互称官职，随着官职升迁变化，称呼也随之改变。如果一个人有多项官职，则称呼级别较高的；如果官职是副职，则一般去掉副字。二是党内称呼市场化。将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的称呼用到党内生活中，如“老板”“老总”等。三是党内称呼江湖化。把社会上的一些称呼用语用到党内中，如“老大”“老爷子”等。四是党内称呼亲戚化。现在有些人为了显示亲密，在党内也称兄道弟、呼姐唤妹。年龄大的叫“某哥”“某姐”，年龄小的称“某弟”“某妹”。这些称呼既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和党内关系的严肃性，又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整体形象，不利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和党的作风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党的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强调党内要讲政治规矩。党内互称同志就是党内政治生态良好的重要指征，是党的重要政治规矩。虽然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已经认识到了在党内互称同志的重要意义，但在党内互称同志的气候仍未真正形成，尤其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仍是叫声同志不容易。党内互称同志为何难进行？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到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权力崇拜意识、唯官唯上倾向还不同程度存在，并表现在党内称呼的运用上。行为习惯尤其是群体行为习惯，一旦养成，不易改变。

党内互称同志，是加强党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党的重要政治规矩，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在党内一律称同志，有助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平等观念提高权利意识，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风气；有助于克服封建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有助于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保持清醒头脑，放下领导架子，务实清廉为民，脚踏实地干事。

党内称呼正常化非小事，我们必须找到原因、克服困难，采取措施让党内互称同志的风气重新对起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加强教育宣传，督促转变认识。称呼的变化实际是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可以通过党内教育督促党员放下心理束缚，主动接受正确观念，认识到党内称呼并不是小事，而体现的是一种彼此平等的政治关系。正确观念转变和形成后，应鼓励全体党员身体力行地去做、去实践，慢慢地，就习惯了，也就自然了。其次，制定相应规范，党内强制推行。既然互称同志是党内的政治规矩，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落实践行。如果只是高喊宣传，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有损党内政治规矩的权威性严肃性。中央可以下文明确规定使用同志称呼的场合。在党内政治生活，如党内会议、民主生活会、学习交流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场合都应该规范称呼，使用同志称呼。最后，要使党内互称同志蔚然成风，形成气候，领导干部必须首先转变认识，积极主动地在党内活动的各个场合互称同志，上行下效，党内才能形成互称同志的良好氛围。

党的思想史

注重科学的调研方法

□ 邱耕田 韩冰慧

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陕北农村到首都北京，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不论岗位怎么提升，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强调“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当作打开工作局面的第一把锁钥，为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跟习近平总书记学调查研究，重点在于学习他的科学方法。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科学方法的论述，散见于《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同呼吸才能心相印》等报道中，蕴藏在《办法就在群众中》《谈谈调查研究》等著作及在各地调研时的讲话里。深入梳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领悟到总书记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主要有四招。

第一招，坚持调研开局，做到“明白情况，胸中有数”。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6月到宁德，6月初调研，主政第一个月，走访9个县，布局工作以调查研究为起笔，《摆脱贫困》以《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为开篇；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千头万绪，依旧从调查研究入手，时评专栏“之江新语”以《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亮相。理论修养再深厚，国际视野再开阔，干事之心再热切，不能深刻理解“地方特点，时代特征”，领导干部提出的发展愿景，不是“空谈误国”，就是“一厢情愿”。只有通过调研，认真吃透“下情”，才能真正领会“上情”，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协调一致。

第二招，推进调研深入，做到“细致周全，求真务实”。一些领导干部有调查研究的意识，有调查研究的行程，却没有调查调研的恒心，“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只看成绩，不看问题；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势必“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就一针见血地批评了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领导干部只有在调查研究中，充分酝酿，全面考察，既有大量合乎实际的“调查”成果，又运用理性思维进行“研究”，在制定长短期的发展战略时，才能瓜熟蒂落，一朝分娩。

第三招，保持调研主动，做到“走近群众，深入基层”。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中国经济转型挺进纵深，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挑战着领导干部认识矛盾、处理问题的执政意识与执政素质。单纯看材料，止步于旧认知，既不能追踪工作领域中的最新动态，也不能克服“本领恐慌”。只有积极主动地调查研究，倾听人民呼声，了解最新趋势，才能制定方针有依据、落实政策有目标。《领导下访是一举多得的有益创举》《领导下访必须注重实效》《领导下访的方式方法要不断深化》等，全面阐释了“领导下访”这个调查研究的新方式。群众上访，是表达民意；领导下访，是体察民情。上访容易导致不合意，下访最能温暖人心。领导干部主动调研，走近群众，深入基层，可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第四招，完善调研制度，做到“经常调研，有效调研”。新形势下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关键在于完善调研制度，确保调研成果及时有效。《谈谈调查研究》中，重点论述了“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论证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的联系点制度”。这就从领导干部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角度，深入论证了调研的科学方法，指明了各级干部如何立足岗位职责，达到调研效果的最大化。